

教育促进共同富裕之“提低扩中”效应 ——兼论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现状

何沛芸, 云如先, 黄 斌

(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 南京 210023)

摘 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与必经之路,教育则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措施。采用 2012—2018 年微观与宏观数据就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现状以及教育的提低、扩中作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但低收入群体仍占较大比重;上海、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已超 50%,其余地区的收入分配结构正处于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的阶段;教育对社会收入分配具有提低、扩中的作用,它能显著降低低收入群体占比,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教育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的提低、扩中作用显著高于基础教育;相较于教育数量扩展,教育质量提升对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更具改善作用。因此,要将教育优先发展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动力基础;重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促进高等教育的优质均衡化发展;提升教育发展质量,打造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关键词:教育;共同富裕;“提低扩中”;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24)02-0030-10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目标。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其中,“富裕”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体现着“效率”,即做大“蛋糕”;“共同”反映的是改革发展成果的普惠程度,体现着“公平”,即分好“蛋糕”。不难发现,“富裕”是基础、起点,“共同的富裕”才是最终目标,持续做大“蛋糕”的同时如何分好“蛋糕”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明确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总的思路是“……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1]。可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加快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也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重要标志。此外,实现共同富裕也离不开我国教育事业的强有力支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2]。20 世纪 60 年代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学界围绕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做了大量研究,目前对于教育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也已达成共识。教育能够促进“富裕”,那么能否在富裕的基础上再促进“共同富裕”呢?纵观既有研究,大多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战略性与政策性重大招标课题“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研究”(A/2022/a2);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校教师学缘结构与学术创新发展研究”(KYCX23_0030)。

作者简介:何沛芸,男,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云如先(通讯作者),男,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黄斌,男,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者从理论层面对此进行探讨,认为教育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应然作用,但这一点却未能在经验实然研究中达成共识,对于教育能否有效改善收入差距,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还存有争议。为此,本文将基于大型微观调查数据,首先采用核密度图就我国居民收入分布特征与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行测算;其次,通过将既有微观、宏观数据有效结合,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教育在社会收入分配中是否具有提低、扩中作用。

二、文献综述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提出“庶”“富”“教”的思想。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也探讨过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但直至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问世才真正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推向高潮。

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既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探讨教育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利用索洛余值法就教育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发现美国1929—1957年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2.49%^[3]。曼昆(N. Gregory Mankiw)则直接将教育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核算方程中,利用1985年的国别数据测得教育对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50%^[4]。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较高贡献率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探究,发现教育既能够从微观层面上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与劳动生产率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5-6],又能够从宏观层面上促进技术进步从而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于经济增长^[7-10]。也有学者总结性地指出教育与经济增长核算方程中的技术、资本以及劳动三个要素均具有密切联系,由此影响经济增长^[11]。另一类则是探究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例如,国内外有较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教育能够有效缩小收入差距,改善较低居民收入的不平等^[12-15],且相较于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而言,高等教育获得更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16-17]。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教育并不能改善收入分配,反而会加剧收入不平等^[18-20]。

当前国内外系统地探究教育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就教育是否能够改善收入不平等

这一问题目前还尚未达成经验共识。此外,目前国内主要是通过计算城乡间、地区间等居民收入的差值、比值,或测算出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变量予以反映收入不平等,但很少有学者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视角去直接探究教育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问题。鉴于此,本文利用我国既有大型微观调查数据库,将微观、宏观数据相结合形成四期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探讨教育发展能否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以期丰富相关研究的同时为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实践方向与经验证据。

三、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现状

为了探究教育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提低、扩中作用,本文首先基于大型微观调查数据借助核密度函数图就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现状进行描绘,同时对部分地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行测度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提供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CFPS是一项大规模、长久性的全国社会微观调查项目,自2010年开始每两年跟踪调查一次,采用PPS概率抽样方法调查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中大约16 000个家庭的微观层面(个体、家庭、社区)数据。CFPS调查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丰富的受访者教育信息以及家庭经济信息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①。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非参数统计方法的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对样本居民收入进行拟合,用以描绘我国居民收入分布特征,具体估计式如下:

$$f(x) = \frac{1}{n} \sum_{i=1}^n K(x - x_i)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1)$$

上式中, $f(x)$ 为概率密度函数, $K(\cdot)$ 为核函数, h 表示带宽。鉴于核函数的选择对估计结果影响较小,本文将借鉴李金昌和任志远的做法^[21],采用高斯(Gaussian)核函数进行估计,即:

$$k(x) = e^{-\frac{x^2}{2}} / \sqrt{2\pi} \quad (2)$$

带宽则选择高斯核对应的最优带宽,即:

$$h = 1.06\sigma n^{-\frac{1}{5}} \quad (3)$$

上式中, σ 为样本内居民收入的标准差。

①CFPS数据2012年开始对居民收入统计口径进行了修改,本文主要采用2012、2014、2016、2018年四期数据。

（三）我国居民收入分布特征与变化趋势

图1描绘了各调查年度我国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核密度图^①。由图不难看出,我国居民收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右偏分布特征,这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分布结构还主要是金字塔型,即低收入群体仍然占据较大比重。进一步地,通过比较四个调查年度的收入分布还可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人均纯收入核密度图逐渐趋于平缓,峰度逐年下降,右尾部分的核密度曲线有所上升,表明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取得了重大成效,低收入群体规模不断下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逐年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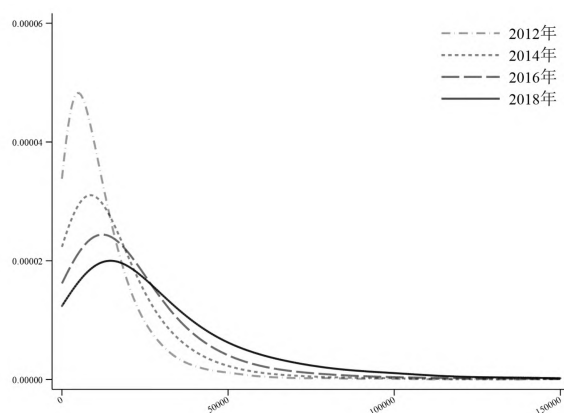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核密度图

其次,考虑到我国各省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本文还分别描绘了数据调查涉及的各省(市、区)家庭人均纯收入核密度图^②,发现我国各省(市、区)的居民收入分布同样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右偏特征,尤其是广西、江西、贵州、四川、河北等地区,金字塔型的收入分布特征十分明显。与全国整体情况类似,从四期调查数据的核密度图形变化情况亦可发现各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得到较大改善,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居民收入分布核密度图已经接近正态分布,其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与理想状态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相差较小;天津、黑龙江、浙江、湖北等地的居民收入分布核密度图也逐渐趋于平缓,收入分配结构正处于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的过程中。其余地区虽近几年在调整与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上也取得了较大成效,但目前距离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还有一段距离。

（四）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现状

要想稳步推进“提低、扩中、调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精准测量与分析。既有中等收入群体的衡量标准主要有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两类:绝对标准是指根据当地物价情况对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所设定的收入标准。例如有学者在界定全球中产阶级群体时就采用人均日收入位于12至50美元之间这一标准^[22]。相对标准则是以居民收入分布的某一特征指标为基准所设定的统计指标。最为直接的便是根据四等分法或五等分法将收入位于50%或60%的居民划分为中等收入群体,但这一分类法更多的是从统计意义出发而忽略了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意义。因此,学者们更多的是将统计意义与经济意义相结合来测量中等收入群体。例如,我国学者常根据收入中位数的0.5~1.5倍、0.75~1.25倍、0.75~1.5倍来划定中等收入群体^[23-26]。李金昌和任志远通过国际比较,同时利用我国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了详细探讨,提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高收入群体比重应接近3:6:1较为合理,此时所形成这种橄榄型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既保证了收入差距处于合理范围之内,同时又能避免收入结构因高度平均化而抑制经济发展活力的弊端^[21]。本文也将采用同样的测度标准,以收入中位数的0.75~2倍来划定中等收入群体。

图2给出了根据收入中位数0.75~2倍这一标准划定的各省(市、区)在2012与2018两年的不同收入群体比重情况^③。由图可以看出,2018年上海、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已超过50%,初步实现了中等收入群体占较大比重的目标;黑龙江、湖北、浙江、天津等地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呈现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低收入群体比重>高收入群体比重的特征;而广东、陕西、重庆、福建等地还处于低收入群体占较大比重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其次,通过2012与2018两年各地区不同收入群体比重变化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四川、重庆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以“提低”“调高”共促“扩中”的成效最为显著;天津、山东、云南、浙江等11个省(市、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也均在5个百分点以上。总体来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收入分配结构

①考虑到收入分布通常有很长的右尾,为图形便于展示,本文在刻画核密度图时剔除了家庭人均纯收入大于150 000的样本。

②限于篇幅,各省(市、区)家庭人均纯收入核密度图没有在文中展示。

③本文划定中等收入群体是以各地区各自的收入中位数作为标准,这主要是考虑到若以全国层面的统一标准划分,则部分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浙江等)会出现高收入群体占绝大比重的倒三角形收入分配结构,这仅能显示居民收入的省际差异情况,而并不能准确刻画各地内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现实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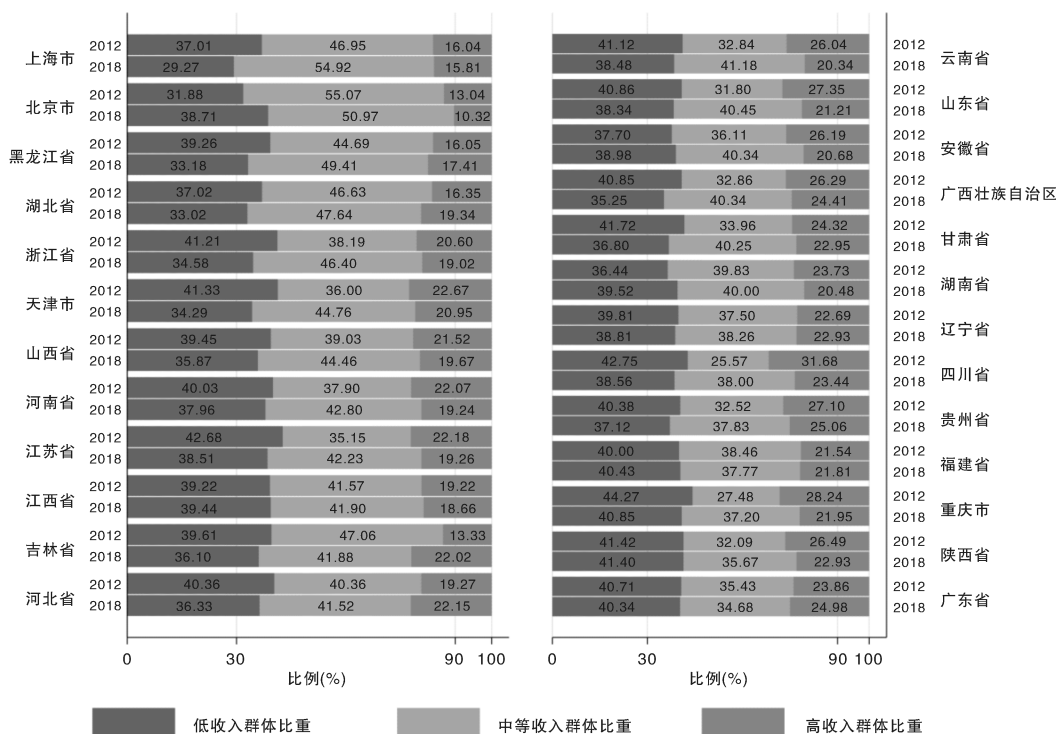


图2 各省(市、区)不同收入群体比重

正处于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的阶段。

图3刻画了2012—2018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同分位点上的增长幅度变化趋势,用以揭示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背后逻辑。从图中不难看出,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主要是由于不同分位点的收入增长幅度不一致所致,收入分位点较低部分,尤其是下20%分位点的收入增长幅度在2012—2018年超过了样本总体的平均增长幅度,更是远高于收入分位点中间部分的同期

增幅。正是由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率高于中等收入人群的同期增长率,才使得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低收入人群不断跃升至中等收入人群,导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上0.1%分位点的收入增幅较大也表明了极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说明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与规范也是我国未来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心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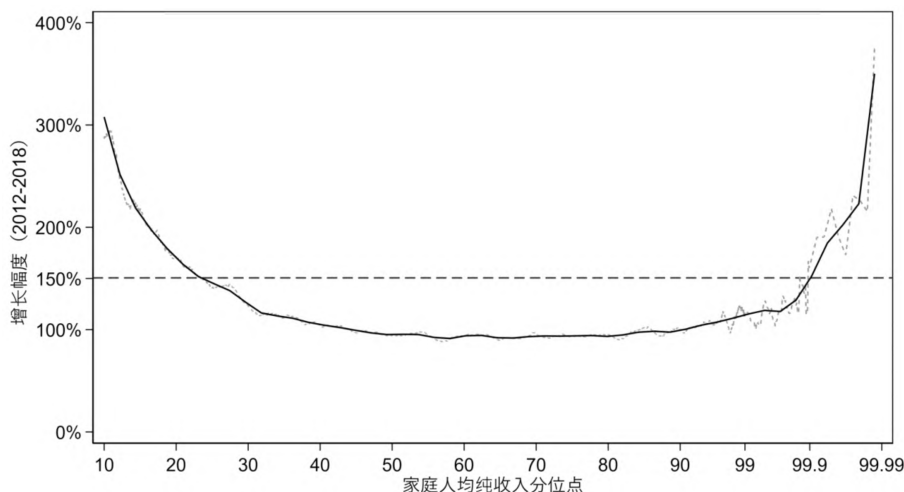


图3 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同分位点增长幅度(2012—2018年)

注:图中虚线为家庭人均纯收入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增长幅度连线,实线为拟合线;150%为样本总增长幅度。

此外,基于各省(市、区)收入分配结构现状,本文以李金昌和任志远提出的我国合理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应使得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高收入群体比

例达到3:6:1为基准^[2],分别测算了各地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距离占比60%的目标还差多少以及其中有多少比例调整是来自于“提低”部分,具体见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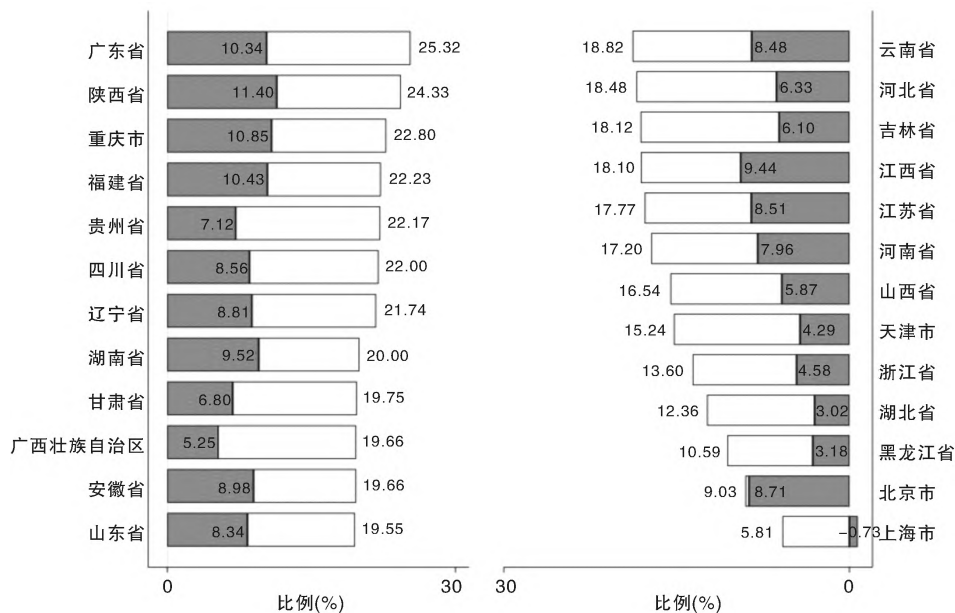


图4 各省(市、区)未来收入分配改革方向

注:图中柱状长度表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与60%占比的差距,阴影部分则表示低收入群体规模与30%占比的差距。

由图4不难看出,上海、北京的“扩中”任务比例已经低于10%,其中,上海低收入群体比重已经低于30%,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应主要借助“调高”实现,而北京则主要是以“提低”促“扩中”。相较之下,其余地区当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比重距离60%的目标还较大,甚至广东、陕西等8省市还需提升20%以上才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占绝大比重的目标。此外,图4还反映了各省(市、区)未来收入分配改革在“提低”与“调高”两方面应略有侧重。例如,贵州、甘肃、广西、天津、浙江、湖北、上海等地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时应主要以“调高”促“扩中”。

四、教育在社会收入分配中的“提低扩中”作用

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参与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而教育又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故而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必然会对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产生重要影响^[27]。为此,本文接下来将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提低”与“扩中”效应进行估计,探究教育在社会收入分配中的“分配效应”。

(一) 计量模型

为了探究教育在收入分配中是否具有提低、扩中作用,本文首先构造如下计量估计式:

$$Proportion_{itr} = \beta_0 + \beta_1 Edu_{itr} + \beta_2 X_{itr} + \delta_r + \theta_i + \varepsilon_{itr} \quad (4)$$

①将样本中所涉的25个省(市、区)分为:华东地区(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华南地区(广东、广西)、华中地区(河南、湖南、湖北);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西北地区(陕西、甘肃)、西南地区(四川、贵州、云南、重庆)、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4)式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r*表示地区^①; *Proportion*表示低收入群体或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Edu*为各省(市、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X*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括:(1)人均GDP。有研究指出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教育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密切相关^[28],因而本文控制了各省(市、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对数值;(2)人口规模。劳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9],为了反映地区人力资源水平,本文控制了各省(市、区)年末总人口(万人)对数值;(3)总抚养比。为了反映各省(市、区)劳动力资源水平,本文还控制了各省(市、区)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即总抚养比);(4)人口出生队列。考虑到不同年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能提供的劳动力情况与薪酬情况不同,故本文还控制了样本中不同年代出生人口的比重。此外,上式中必然还存在一些影响当地收入分配结构不可观测的特征,同时收入分配结构也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变化趋势,因此回归式中还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相关变量说明见表1。

在对样本中主要变量缺失值、异常值做剔除处理,以及对部分变量取对数处理后,所涉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由表中结果看,2012—2018年,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2018年达8.56年,比2012年提高了1.4年;低收入群体比重逐渐下降、中等收入

群体比重逐渐上升,且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幅度大于低收入群体比重的下降幅度,表明近年来我国通过“提低”与“调高”两方面来进行“扩中”的收入分配改革均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教育促进共同富裕:“提低扩中”效应

表 3 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低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回归结果,即教育在调整收入分配中起到的提低、扩中作用。可以发现,在控制了相关经济特征、人口特征变量以及时间与地区的固定效应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能显著降低低收入群体比重以及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起到提低、扩中的社会收入分配调整作用。具体而言,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低收入群体比重将会显著降低 1.160 个百分点,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则会显著增加 2.736 个百分点。结合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现状来看,若我国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在现有基础上再提升 6 年左右将能够基本实现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比例为 3 : 6 : 1 的橄榄型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总体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低收入群体	37.77	3.04	39.88	2.48	37.59	2.89	36.33	2.90	37.29	2.86
中等收入群体	41.72	6.09	37.80	6.63	42.78	5.75	44.27	5.33	42.03	4.86
平均受教育年限	7.98	1.44	7.16	1.44	7.96	1.34	8.24	1.32	8.56	1.36
人均 GDP	10.83	0.45	10.62	0.43	10.78	0.42	10.89	0.43	11.04	0.42
人口规模	8.43	0.52	8.42	0.52	8.43	0.52	8.44	0.53	8.44	0.54
总抚养比	36.45	6.97	34.12	7.41	35.23	6.65	37.13	5.88	39.31	7.10
20 世纪 50 年代及以前	0.21	0.06	0.26	0.05	0.23	0.04	0.19	0.04	0.15	0.03
20 世纪 60 年代	0.24	0.04	0.24	0.04	0.23	0.04	0.23	0.04	0.24	0.04
20 世纪 70 年代	0.22	0.03	0.23	0.03	0.22	0.03	0.22	0.03	0.22	0.03
20 世纪 80 年代	0.22	0.03	0.21	0.03	0.22	0.04	0.23	0.04	0.23	0.03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	0.11	0.05	0.06	0.02	0.10	0.03	0.13	0.03	0.16	0.05
样本量	100		25		25		25		25	

正如前文所述,本文主要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遗漏变量,即模型中难以控制一些可能会影响地区收入分配结构但又不可观测的变量。虽然在模型构建时已经通过加入时间与地区固定效应控制了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差异以及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差异,但有学者也指出在面板数据模型中还有必要加入时间与地区的交互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既随时间变化又随个体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偏估问题^[30]。为此,本文也采取同样的

表 1 变量选取及说明

变量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低收入群体	低收入群体比重(%)	CFPS (2012 — 2018)
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CFPS (2012 — 2018)
主要解释变量:		
平均受教育年限	16~65 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①	CFPS (2012 — 2018)
控制变量:		
人均 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对数值	中国统计年鉴 (2012—2018)
人口规模	年末总人口(万人)对数值	中国统计年鉴 (2012—2018)
总抚养比	非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	中国统计年鉴 (2012—2018)
人口出生队列	样本中不同年代出生人口比重(%)	CFPS (2012 — 2018)

实证手段进行再次估计(如表 4 所示),发现估计系数与表 3 相比并无太大变化,表明本文已经通过控制时间与地区固定效应解决了绝大部分遗漏变量带来的模型偏估问题。

此外,考虑到选取不同的中等收入群体测度划分标准或可能对本文结果产生影响,故本文更换不同的测度标准,采取按中位数的 0.75~1.25 倍、0.75~1.5 倍划分进行重新回归分析。从表 5 中结果来看,即使更换不同的划分标准,本文估计结论依旧稳健。

①剔除了在读学生样本。

表 3 教育对收入分配的“提低扩中”作用

	低收入群体 (提低效应)		中等收入群体 (扩中效应)	
	(1)	(2)	(3)	(4)
平均受教育年限	-1.102*** (0.317)	-1.160** (0.499)	2.611*** (0.731)	2.736** (1.010)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47.071*** (2.291)	42.169** (18.302)	20.690*** (5.288)	80.656* (41.295)
样本量	100	100	100	100
拟合优度 R ²	0.423	0.537	0.624	0.695

注：*p<0.1,**p<0.05,***p<0.01;括号中为聚类到省际层面的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GDP、人口规模、总抚养比、人口出生队列等变量。后表同。

表 4 稳健性检验

	(1)	(2)
	低收入群体 (提低效应)	中等收入群体 (扩中效应)
平均受教育年限	-1.219** (0.584)	2.938** (1.148)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常数项	42.079* (22.159)	92.853* (51.785)
样本量	100	100
拟合优度 R ²	0.599	0.746

表 6 异质性分析

	低收入群体(提低效应)			中等收入群体(扩中效应)		
	(1)	(2)	(3)	(4)	(5)	(6)
中等教育比重	-0.026(0.055)	0.013(0.048)		0.202(0.140)	0.098(0.098)	
高等教育比重	-0.323*** (0.058)		-0.240*** (0.077)	0.457** (0.173)		0.299(0.190)
中等教育阶段人均经费支出 (对数值)		-6.140*** (1.282)			11.717*** (2.676)	
高等教育阶段人均经费支出 (对数值)			-4.270** (1.893)			10.541** (4.79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9.463* (16.341)	89.639*** (13.895)	68.016*** (22.351)	96.766** (43.047)	-8.726(33.090)	-1.822(57.600)
样本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拟合优度 R ²	0.579	0.586	0.602	0.704	0.740	0.728

表 5 更换中等收入群体测度标准的估计结果

测度标准	0.75~1.25 倍		0.75~1.5 倍	
	低收入群 体(提低 效应)	中等收入 群体(扩 中效应)	低收入群 体(提低 效应)	中等收入 群体(扩中 效应)
平均受教育年限	-1.160** (0.499)	0.022* (0.010)	-1.160** (0.499)	0.027* (0.01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42.169** (18.302)	0.360 (0.287)	42.169** (18.302)	0.528 (0.368)
样本量	100	100	100	100
拟合优度 R ²	0.537	0.621	0.537	0.679

(三)进一步讨论

1.教育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实现

考虑到我国的教育体系主要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三大阶段,本文以初等教育为参照,探讨了哪一级教育在调节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作用最大。由表 6(1)(4)列结果不难看出,教育阶段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中确实具有异质影响。相较于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阶段似乎主要承载着教育的分配效应,即扩大高等教育阶段人群比重更能有效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故而我国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应当有所侧重地发展高等教育,持续扩大高等教育人群比重,这将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起到助推作用。

2.教育质量提升对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更具改善作用

有部分学者认为除了发展教育规模外,提升教育

质量对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更为关键^[31-33]。为此本文将中等、高等教育阶段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作为教育质量的代理指标放入模型中,如表 6(2)(3)(5)(6)列所示,发现相较于教育数量,提升各阶段教育质量确实能极大程度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在保持现有教育规模不变的条件下,中等或高等教育阶段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平均每增加 1%,将能够分别有效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11.717 与 10.541 个百分点。

3.可通过教育数量扩展与质量提升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本文利用上述实证结果并基于当前社会收入分

配结构现状分别测算了各地如何通过教育数量扩展与质量提升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具体见图 5 所示。从图中结果来看,若仅依靠教育数量扩展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多数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还需要提升 6 年以上;若仅依靠教育质量提升,则多数地区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支出还需增加两个百分点以上。这表明,教育数量扩展与教育质量提升均是各地实现橄榄型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手段,各地应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合理运用两种手段进行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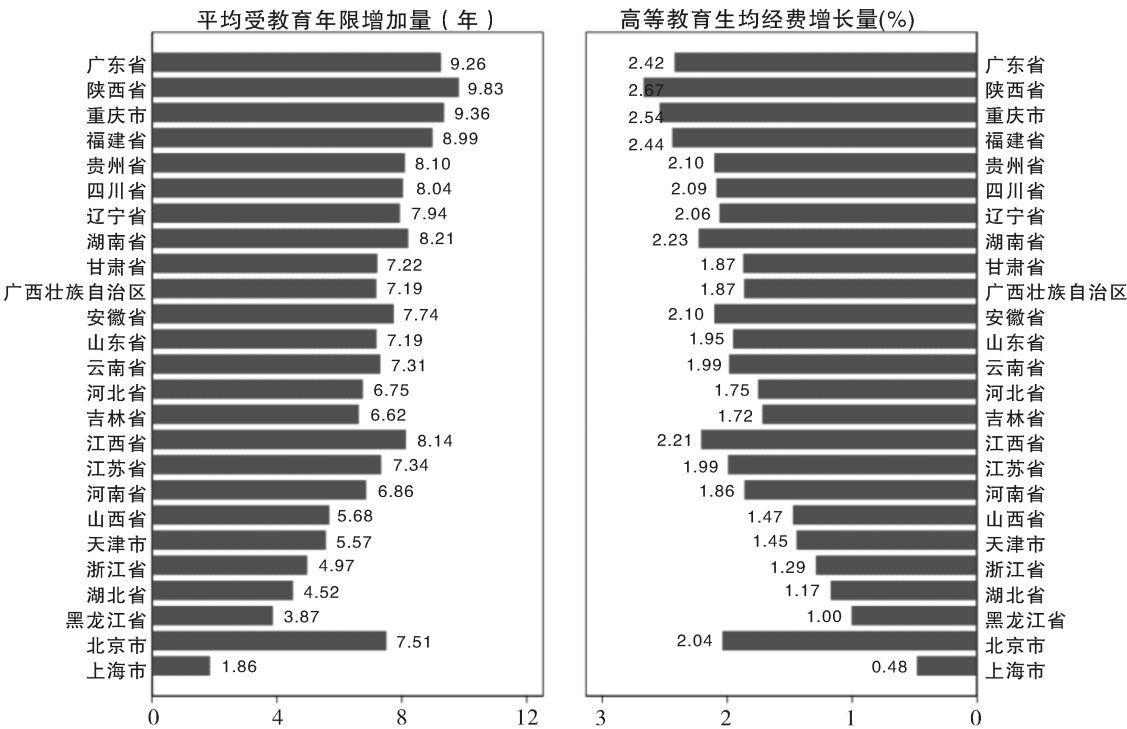


图 5 各省(市、区)橄榄型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实现路径

五、结论与启示

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促使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是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本文借助既有微观与宏观数据就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结构现状以及教育在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中起到的提低、扩中作用进行了分析。首先,本文基于 CFPS2012—2018 年四期的调查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发现近几年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但整体而言,我国居民收入分布的右偏特征比较明显,低收入群体占比较大比重的金字塔型仍然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结构的主要特征。其次,通过对我国 25 个省(市、区)中等收入

群体进行测量发现,我国多数地区收入分配结构正处于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的阶段,上海、北京已初步实现了中等收入群体占较大比重的目标。再次,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能显著降低低收入群体比重以及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起到提低、扩中的社会收入分配调整作用,若我国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在现有基础上再提升 6 年左右将能够基本实现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比例为 3 : 6 : 1 的橄榄型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教育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实现,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能够有效降低低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同时,相较于教育数量,教育质量提升对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更具改善作用;此外,经

过测算发现各地均可通过教育数量扩展与质量提升实现橄榄型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基于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教育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发现教育能有效减少低收入群体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故应积极把握教育对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重要意义,要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地区间的现实差异差异化设定不同的中等收入群体界限,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要分好地区内的“蛋糕”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同时将教育优先发展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动力基础,通过教育实现“富国”“强国”。

第二,高等教育以及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加速推动我国形成橄榄型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关键。本研究发现教育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的提低、扩中作用显著高于基础教育;同时,相较于教育数量扩展,教育质量提升对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更具改善作用。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要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重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扩大高等教育人群规模,加大对高等教育资源弱势地区的扶持力度,促进高等教育的优质均衡化发展。与此同时,还应努力推进我国教育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过程转换,各地应因地制宜,结合自身教育发展实际,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提升教育发展质量,打造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参 考 文 献

- [1]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 [2]习近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1).
- [3]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1): 1-17.
- [4]MANKIW N G, ROMER D, WEIL D N.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107(2): 407-437.
- [5]BARRO R J.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2): 12-17.
- [6]闵维方.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15(3):123-136.
- [7]NELSON R R, PHELPS E S. Investment in humans,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6, 56(1/2): 69-75.
- [8]ARAZMURADOV A, MARTINI G, SCOTTI D. Determinant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es: a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J]. Economic systems, 2014, 38(1): 115-135.
- [9]金戈.不同层次和来源教育投入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浙江社会科学,2014,214(6):117-127.
- [10]张心悦,马莉萍.高等教育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J].教育研究,2022,43(1):35-46.
- [11]杜育红,赵冉.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素积累、效率提升抑或资本互补? [J].教育研究,2018,39(5):27-35.
- [12]HANUSHEK E A, KIMKO D D. Schooling, labor-force quality, and the growth of na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5): 1184-1208.
- [13]HANUSHEK E A, WOESSMANN L. The role of cognitive skill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8, 46(3): 607-668.
- [14]熊广勤,张卫东.教育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J].统计研究,2010,27(11):40-46.
- [15]方超,黄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流动人口的教育回报与工资收入差距的分解[J].教育科学,2017,33(6):8-16.
- [16]于德弘,陆根书.论我国高等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00(6):70-74.
- [17]DIAS J. Educational system, income inequality and growth: the median voter's decision[J]. Estudos economicos, 2005, 35: 81-100.
- [18]SYLWESTER K. Enrol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hanges in income inequality[J].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3, 55(3): 249-262.
- [19]杨俊,黄潇,李晓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 172(1):38-47.
- [20]方超,黄斌.高校扩招政策与乡城转移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基于模糊断点设计的工具变量估计[J].中国高教研究,2021,334(6):44-50.
- [21]李金昌,任志远.共同富裕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与合理规模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3,38(2):16-28.
- [22]MILANOVIC B, YITZHAKI S. Decomposing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does the world have a middle class?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2, 48(2): 155-178.
- [23]朱长存.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测度与分解——基于非参数估计的收入分布方法[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28(2):63-69.
- [24]曹景林,邵凌楠.基于消费视角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分布及变动测度[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5,30(6):4-15.
- [25]龙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的因素分解——基于收入极化指数的经验证据[J].统计研究,2015,32(2):37-43.
- [26]吴鹏,常远.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与现状研究——基于CHNS与CHIP数据[J].社会科学研究,2018,235(2):72-82.

[27]黄斌,李波,方超. 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独特作用:理论应然与经验实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41(10): 12-26.

[28]丁小浩,杨素红,陈得春. 教育与收入不平等——对教育库兹涅茨曲线的一个实证检验[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2, 20(3): 137-164.

[29]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70(1): 65-94.

[30]BAI J. Panel data models with interactive fixed effects [J]. Econometrica, 2009, 77(4): 1229-1279.

[31]赵丽秋.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不平等——教育质量不平等的影响[J].南方经济,2006(4):15-23.

[32]曾嘉.教育质量不平等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中等教育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22(4):62-68.

[33]杜育红,赵冉,李立国,等.教育与共同富裕笔谈[J].教育经济评论,2022,7(3):3-22.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Disucss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Social Income

Peiyun He, Ruxian Yu, Bin Hua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Expanding the proportion of middle-income groups i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necessary way to solid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our country. Education is a major measure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of residents,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The micro and macro data from 2012 to 2018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downsizing the low-income group and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has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nd the middle-income group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but the low-income group still occupies a large proportion. The proportion of middle-income groups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has exceeded 50% ,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n other regions is in the transition stage from “pyramid” to “olive”. Education plays a role in optimizing so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by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proportion of low-income groups and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middle-income groups. The adjustment of the so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by education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lowering and expanding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basic education. Compar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 quantity,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quality is mor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so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Therefore, we should given priority to educ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build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 education; common prosperity; downsizing the low-income and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so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责任编辑 张河森